

编者按：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质量逐步提升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度建设层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根据四中全会文件中的表述，高质量发展包括三个要素：第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二，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应有不同的“规划”和“路径”。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我们要的高质量发展是更充分更均衡的发展，必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经济的动态平衡。从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过程，转向关注增长的结果和增长的效益；从关注经济增长一个维度，转向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从片面重视高增长产业，转向关注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关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向关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要素优化配置；从关注GDP，转向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安排和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同时，高质量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且该理念已形成共识。

本期推出“高质量发展（下）”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通过结合上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发展现状等进行研究，本期着重提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深度思考等方面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实施路径，希望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些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高质量发展（下）

- 02 实体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 13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惯性思维
- 15 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点思考

全球大观

- 16 金砖国家合作：变局下的使命

文化漫步

- 19 组织管理中的“能者多劳”合理吗？

悦读时光

- 封三 年度十大流行语标注社会脉动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19年12月17日

印 数：3400-3600

实体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同时,高质量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且该理念已形成共识。但就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以及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分析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高质量溢价概念”,即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盖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企业及其产品服务协同的动态发展体系。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关键突破口,所以,企业怎样实施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满足企业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环境需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失衡,凸显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平衡,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存在一些问题和潜在的风险。

实体经济的问题除了来自自身的创意创新、质量品

牌等方面的不足,还有来自虚拟经济潜在的威胁。一方面,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自循环发展,同时金融业导致房地产业形成死循环,存在较大的泡沫风险;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面临许多新问题,如扣除实体经济平台,真正的实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生态与文化环境亟需改进。更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领域的一些企业由于创新不足、竞争力弱、利润空间有限,只能在原材料等要素上打折,以超标排放降低成本,生产出质量低或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结果不仅导致实体经济自身受到伤害,而且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瓶颈。以上问题都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一方面,社会资源本来应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但由于虚拟经济回报快且利润高,从而吸收大量资本等资源进行自循环,既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的资本等资源投入,又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游离实体经济自循环,形成了不良的生态文化,对人们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力和资本都追逐虚拟经济,对作为“实体经济灵魂”的质量、品质、品牌,以及踏实、吃苦、肯干的制造业文化、工匠精神,都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以致一些制造业转而发展金融地产,既加剧了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又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结果整个经济陷入“入虚脱实”的境地。实体经济难以支撑虚拟经济,尤其制造业产业托不住金融或房地产业,而金融既然不能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足够收入,那就只能再通过金融交易加杠杆、创造价差。这种“资本空转”在较弱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人为地创造较大的金融泡沫,对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这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从“金融是政治”理念着手治理并取得成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7年11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马凯主任在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提高统筹防范风险能力,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2017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央着手解决金融监管,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2017年12月1日,银监会首次定义现金贷,并划定七条风险底线。同时,专家学者还引入“绿色金融”监管机制,有利于对金融工作加强全方位监管与问责。

无疑,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严金融监管,不管从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看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应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发展实体经济,对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要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进而规避、减弱或消除潜在的风险。这就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辩证关系。在人类社会有剩余产品时产生交换需求,进而等价物出现,因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两者不可缺失、不可分离,但在实际生活中,准确、合理、有效地处理好两者的平衡关系,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应该看到,速度与质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很难谈到发展的质量,高质量发展同时注重发展的“量”和“质”。其显著特征是:从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过程,转向关注增长的结果和增长的效益;从关注经济增长一个维度,转向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从片面重视高增长产业,转向关注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关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向关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要素优化

配置;从关注GDP,转向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安排和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我们要的高质量发展是更充分更均衡的发展,并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一方面,整体经济是人类社会永续、动态和复杂的劳动与生产过程,这种客观复杂性决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相对的平衡关系的理解与认识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只有在正确理解两者关系的前提下,追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平衡,使整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地运行。可见,什么是相对平衡与如何把握相对平衡成为问题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关系与特点,从而有利于准确把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第一,实体经济具有品质特征,虚拟经济具有文化特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最大的特征是满足人类的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需求。虚拟经济是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固然虚拟经济通过创新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从经济发展时序上说,实体经济呈长期趋势,而虚拟经济是围绕趋势的波动,当然这种波动代表着激励或势能,也是一种动能,体现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波动对应趋势基准应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幅度,两者表现为统计学上的均值与标准差的关系。标准差的大小,代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度量。从长期发展来看,实体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产品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现为品质。而虚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服务与艺术,表现为文化,只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融为一体,才能形成国家经济的品牌。

第二,实体经济具有重资产型特征,虚拟经济具有轻资产型特征。从投入要素来看,相对来讲:实体经济投入的知识少,虚拟经济投入的知识多。也就是说,实体经济价值中知识所占的比重小,即脑力和智力劳动所占的比重小。而虚拟经济价值中知识所占的比例大,即脑力和智力劳动所占的比重大。从从业人员受教育的年限来看,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虚拟经济从业人员。从劳动者报酬来看,实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平均收入低于虚拟经济的从业人员。从管理上来看,实体经济在微观上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大,虚拟经济在宏观上对整体经济作用大。因此,实体经济表现为硬或重资产型经济,而虚拟经济表现为软或轻资产型经济。实

体经济的生产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智力、知识创新与应用,同时还需要大量厂房、机器、仪器设备与流水线等投入要素,而虚拟经济的生产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知识创新与应用。

第三,实体经济具有约束性,虚拟经济无约束性。实体经济受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限制,其发展规模与市场规则是可以预期且可以控制的。但由于虚拟经济具有预期或非预期的放大的正负作用或溢出效应,如计算机的出现本来是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结果它改变了世界;又如雷达仿生放大了人类眼睛的功能,让人类实现了太空梦想;再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

因此,虚拟经济原本应实体经济需求而产生,但一旦产生,难免会出现“游离实体经济外发展”的背离现象。也就是说,虚拟经济由于不像实体经济那样,受各种投入要素如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等的限制,其发展动机与规模按市场规则可以预期或不可预期,但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关键是如何认识这种背离现象,如果把这种背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正是虚拟经济溢出的正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的体现。但是如果不加监管与控制,这种背离就会自然膨胀;当超出某一阈值后,就会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表现为虚拟经济产生巨大的泡沫风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伤害,以致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拟经济导致泡沫破裂,国家经济崩盘。

因此,正确认识与判断虚拟经济的正负作用,以及正负作用拐点的阈值是十分重要的。进而发挥其正作用,抑制或减弱或转化其负作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自身也获得良好的发展。如“扁鹊三兄弟悖论”,扁鹊善起死回生而传世,他的二哥善疑难杂症而有名,他的大哥善预防而无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预防无法求证,所以很难让人相信。因此,对虚拟经济进行控制,尤其是预控是很难的,但又是必要的。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监管与控制。

第四,实体经济相对“实”,虚拟经济相对“虚”。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这是两者相互提供投入要素与循环融合的结果,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一方面,实体经济体现在“实”,是指它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其生产需要各种投入要素。虚拟经济体现在“虚”,是指为提供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生产所需要的服务。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直

接创造出货真价实的利润,而虚拟经济本身创造虚拟或数字利润,只有把虚拟经济融入并借助实体经济才能创造真正的利润。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定价问题,虚拟经济中的资金空转就会产生风险,且空转次数越多,产生的风险越大。此外,理论上讲,实体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且这种关系表现为虚拟网络关系;虚拟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虚拟网络关系;同时,实体经济的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即使我们只考虑实体经济及其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统计上讲,这也是多维均值与标准差的非线性叠加关系。

因此,把握这种关系的难度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把握实体经济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内在的关系,既要平衡实体经济产业发展,又能做好虚拟经济中的制度和政策制定、监管等工作,满足实体经济产业的需要,还能发展虚拟经济。正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虚与实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虚拟经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作用,远大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也是需要严加监管虚拟经济的理由。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是国家整体经济的基本面,又是坚实的脊梁;而虚拟经济是整体经济的晴雨表,彰显未来的信心,但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坚实基础之上,否则晴雨表失灵,信心不足。同时,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还体现为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和不对等性。这对我们把握两者的相对平衡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与难度。如果把握好了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就能呈良性循环,整体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但针对它们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因此严加监管与控制虚拟经济,要比控制实体经济更加必要。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根据以上分析,基于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具有复杂、综合、动态、不对等性的相对平衡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以满足发展实体经济需要,从严、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那么,发展实体经济需要营造以下五个环境。

(一)企业家成长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实体经济是解

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同时，实体经济是推进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2017年9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努力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说过：“企业家的作用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强调创业精神，认为企业家就是创业者，是开创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可见企业家不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是负有理想、勇于作为和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是国家经济脊梁的顶梁柱。试想一个国家没有人愿意当企业家，那将会是什么情形？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让那些想成为并有能力成为企业家的人，在创业中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创业中成长。

首先，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创新特质、资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消费者未来的需求，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要尊重企业家，肯定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正确看待他们，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形成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最后，营造企业家文化，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职责、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可以有效地为企业家成长、工匠人才培养、质量与品牌提升、人工智能引领、金融监管营造文化环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为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更好的文化氛围和更大的文化力量。

（二）工匠人才培养环境

要营造社会氛围，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

拟经济的相对平衡关系。一方面，尊重和发展实体经济是我们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的基本需要。建立正确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以及生活观与生命观，根据兴趣爱好选择职业，这样有利于转变就业观念，有利于实体经济创新，有利于追求美好生活，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敬畏和发展实体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推行王浩院士基于“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水管理”提出的“自律式”发展思想，这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底线。否则，发展了实体经济却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是得不偿失的，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为此，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我们既要坚决摒弃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理念，坚决杜绝吃“子孙饭”的错误行为。同时，我们还需要营造培养工匠人才的社会环境。

首先，要弘扬工匠精神。长城、都江堰、故宫、红旗渠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世界奇迹，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象征，更是我国工匠精神的典范。新时代，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工匠人才”的社会氛围。其次，要营造工匠文化。大力宣传我国历史与当代各行各业工匠大师“坚守初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宣传他们“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执着踏实的工作信念与态度，宣传他们成长成才的事迹与贡献，让历史记住他们，让当代人以及后辈敬仰他们。

最后，要营造制造业文化。对于制造业，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是反映其水平与质量技术指标的“三度”，这“三度”可以高度概括为“态度”。一要从态度上敬畏资源、敬畏环境、敬畏制造、敬畏产品；二要从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上敬畏设计、敬畏技术、敬畏工艺，营造制造业文化，以形成劳动者有信仰的态度，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创新合作、精益求精的风气，为那些想成为新时代工匠人才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三）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质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成为主题。坚持质量第一，推动质量变革，增强质量优势，建设质量强国成为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贺信中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质量的需求，新时代就是质量时代。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营造实体经济质量环境，需要从以下五个部分着手。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地增强了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凸显了质量特别是制造业质量的特殊重要性。

“质量为先”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条基本方针。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为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应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要下最大力气开展质量攻关、提升质量标准、提高进出口商品质量、加强全面质量监管、打造质量品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每个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国家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传递质量信任、培养质量人才。我们需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积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升级版”工作,大力推动建立突出行业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建立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推动开展整合管理体系认证,加快认证技术创新,鼓励开展认证增值服务。

第三,在制造业研发创新中积极推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即负责任创新。负责任创新是哲学家海斯托姆、欧文等,在叶韦伯、约纳斯、伦克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和“预防伦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欧文认为,负责任创新意味着通过目前对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来关注未来。欧盟委员会委员尚伯格进一步认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此过程中多方面彼此呼应,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和其适销产品的能力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赞许性,使科技进步适当地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负责任创新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设计、制造与消费,开展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质量保证方法体系上,积极推行“双归零质量保障方法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航天工作者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创造而提出的质量保障方法体系。“双归零”追求的是工程产品和工程过程在质量和管理上两个方面的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术归零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而管理归零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可见,该体系对于制造业具有普遍价值。

第四,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保护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得质量溢价。在营造质量环境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因为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因市场机制与规则缺失或失灵,市场上不能形成优质优价即质量溢价,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这样的市场环境既不利于实施质量战略,也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必须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足够多的利润,实现质量持续改进与提升。为此,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打击违法排放,杜绝劣币驱良币现象,给优质产品较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以确保优质产品获得质量溢价,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实体经济品牌质量,进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创造品牌溢价。由于品质是由产品或服务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达的,所以需要从品质和文化两个方面开展品牌建设。同样,创造品牌需要更大的投入,生产的成本更高。成本包括品牌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如研发创新失败费等。鉴于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其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品牌产品更应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在定价机制和政策方面应允许有一个较高的品牌溢价。同时还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品牌产品提供一个干干净净的环境,让品牌企业获得高的回报,实现品牌溢价,让品牌企业以质量为基础,以创新为灵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未来有机会、有资源、有发展,培育创造出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值得重视的是,积极借助军民融合,把国防、航天、军工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用于民用产品开发制造,创造中国品牌是大有可为的。

(四) 人工智能引领环境

实体经济的空间布局在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城市是实体经济的载体。因此,首先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是智慧,因此既要用智慧建设城市,也要用智慧发展实体经济。

一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主要体现在“智慧”两个字上,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从城市建设理念、定位、功能、路径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每个城市都应充分利用智慧的力量,并把智慧融入市场功能、规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交通、

金融、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甚至社区、医院、学校、商业场所都要实现智慧化。比如在城市建设中,应考虑城市采光与通风,既避免光污染与通风不畅,又有利于防火。城市空间造型与色彩上,既外显城市文化与精神,彰显建筑美,又要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挖掘中国古城地下排水系统的神奇功能,设计城市排水系统,在材料选择上减少能耗,要绿色化。工业园区、社区、保护区、处理区、消费区、政府服务区的规划要科学合理。居民住房、城市街道与生产、供应、服务设施要体现建筑协调,避免家里干净,社会、街道不干净的现象。城市建设材料要选择可拆解可回收利用的,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注意节能减排,实现零排放。

二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实体经济建设。我们要集世界智慧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注重技术、工艺产品与管理创新,发展智慧经济,同时驱动知识创新,发展知识经济。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关系,以及实体经济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需要大智慧、大知识、大技术与大管理。

三是围绕智慧化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化实体经济,或围绕智慧化实体经济建设智慧化城市,把实体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落实好规划精神。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根据规划的内容,利用知识创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及信息网络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飞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平台,又是与社会新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渗透性,即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流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流将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动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能源、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引领,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驱动知识流的三大关键技术。因此,通过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应用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水平。同时,应用知识、数据、算法和应用领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关注和利用我国大科学与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取得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

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

(五)金融监管加严环境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发展虚拟经济,更重要的是把握两者的平衡。首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同样虚拟经济发展也需要政策,但这种政策要以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应以绿色发展为抓手,实施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与绿色制造业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一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设计、制造、消费政策,同时推行绿色金融。所谓“金融思维”以支持绿色实体经济发展为前提,特别强调所谓“财富等于收入加债务”的观念是错误的,“家庭的职务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这一观点也有失偏颇,会误导或诱导人们过度负债与过度理财,追求一夜暴富,加剧资本自循环。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精准政策,实施严格的阶梯税率,减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巨大差异。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尊重知识、技术、人才,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国民收入初次与再次分配中,利用税收、法律、保险等政策,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或对实体经济减税,让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保持相对平衡,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以及生活观与生命观,有利于社会和谐。

其次,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对平衡,以及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处于良性循环时,不需要调控;但当它们处于失衡状态时,则需要调控。在调控方向选择遇到矛盾时,应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也就是以有利于实体经济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时就需要虚拟经济作出牺牲,却不能为了虚拟经济牺牲实体经济。至于调控力度的确定,则需要通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多维相对平衡关系的测度以及阈值,从而判断两者是否处于相对平衡或良性循环,以及确定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为此,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对金融严加监管。不可否认,

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尤其金融科技为金融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了金融创新,同时也对金融生态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金融监管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应对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监管科技应运而生。鉴于金融科技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金融体系,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和自伺服等特征,监管科技同样强调新技术,诸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在监管领域的应用,以提升监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实现“主动式监管”。通过加严监管,让资本向着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向流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着资本方向流动,更不是资本的自循环,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强国家经济脊梁,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四、实体经济发展的选择：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还提出“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以及“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至此,高质量发展已形成共识,并且全面实施高质量发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

但有必要对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做些思考。高质量发展作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抓手,是保护与振兴实体经济,尤其做实、做强、做精制造业的生命线。应从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系统出发理清高质量发展体系,从而真正把高质量发展理念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对高质量发展,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有必要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内在的逻辑关系。

首先,关于质量与高质量。在物理学中,质量是指物体的一种性质,即物体所含的物质的量。它是度量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这里我们不考虑物理量,我们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领域。在经济领域,质量是指事物、

产品、服务和工作所具有的一种固有的特征、特性及其满足用户或使用者要求的程度。特性是对事物、产品和工作的效能、性能或职能的描述。在社会学领域,质量是指客观价值或主体感受的现量,如观察社会质量,包括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适应性是指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为大众生活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种类和数量的选择性。类似特性或选择性,大多都是可以测度的。同样,满足要求的程度和水准也都是可测度的,特别是在企业领域。

美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认为,产品质量是产品的实用性,即产品能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专家克劳斯比认为,质量是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质量是满足需要。全面质量控制创始人菲根堡姆则认为,质量是营销、设计、制造、维修中各种特性的综合体。我们认为,产品适用性或符合规定要求就是使用要求,并且通过产品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表达产品所具有的固有特性。指标是可以选择的正向指标,即指标数值的大小与功能正相关。无疑,事物、产品和工作所具有的固有特性及其满足要求的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生活的实用性以及水准都有很大的差异,即质量是可以测量的,也有高低之分。

因此,在经济领域,高质量是指事物、产品和工作具有多、高、强、好或特殊的特性,以及满足的程度高;在企业领域,产品高质量是指满足用户使用要求的技术与非技术的指标值高,以及用户使用后获得的满足程度高;在社会领域,高质量是指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种类数量多,且实用性高,或强或好或特殊,以及大众生活水平的标准高。显然,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提供的。值得一提的是,高质量还包括企业、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的高效经营与管理运作。也就是说,高质量具有普适性,即任何领域中的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中都存在高质量的问题。

其次,关于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理论上讲,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是两个维度的描述。高速增长阶段对应低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对应低质量发展,因此从质量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两个维度,可以组合四种情形: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高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当然,主观愿望上我们都选择并追求高质量发展,低质量发展不是我们的选项,但客观现实却确实存在着低质

量发展的现象。这里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事实表明,高速增长阶段也可以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因速度与质量悖论,实现的难度大。同样,低速增长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对容易,但因主观不作为、错作为,或乱作为也可能导致低质量发展。但未来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而无关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但显然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再次,高质量发展的选择。高质量发展既表现为高质量的投入要素,包括人力、技术、资本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也表现为高质量的产出,包括产品、服务、人力、文化、资本以及制度、政治、文化等质量增量。我们把投入要素的质量增量也作为产出,在客观上尊重投入与产出是一个循环过程,在主观上又具有重要的价值,还表现为高效的投入产出运作过程和高的投入产出效益;还表现为对社会和谐、稳定与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的贡献大。因此,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都应追求高质量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高质量发展也可以理解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即以高质量驱动的发展阶段。由高速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但是理论上讲高质量发展就可能对应高速或低速增长阶段,实际上,基于过去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导致的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瓶颈约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不讨论高速或低速增长,但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客观指标上讲,随着经济总量基数尤其是高速增长阶段基数的持续增加,其增长速度一定是递减的,这是客观规律与现实,因此我们唯有高质量发展这一选择。

最后,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适性。基于以上理解与认识,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既包括内容领域横向的维度,即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高质量,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的高质量;也包括开放的层次领域的静态纵向维度,宏观、中观区域或产业与微观企业;还包括反映内外部环境,市场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变化领域的时间动态维度。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三维度的体系,贯穿宏观、中观与微观领域协同的动态发展。这就是对高质量发展中相关质量与高质量、事物或产品服务、工作和大众化生活适应性,以及宏观、中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内在逻辑关系的诠释。

五、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企业高质量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六种情形: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产品、服务或工作质量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生活适应性及水准高的高质量发展。简单概括为

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高质量发展的层次细分。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宏观层次上,重点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及其可持续改进,把握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所谓高质量,就是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的能力与平衡度,即通过市场与政府调控,使相互制约的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资源与生态环境及其变动都在其相对合理的范围里。且宏观经济表现出稳定、健康与可持续状态。当然,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在中观层次上,重点是基于开放的区域或产业资源优势,结合创新,把握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相对动态平衡。同样,高质量是指高的平衡力和平衡度,即通过市场、区域、产业政策引导,使相互制约的资源优劣势、区域或产业差异、优化与产业升级及其变动,都在相对合理的范围里,同时打破区域或产业壁垒,实现资源流向与配置科学化、合理化与高级化,且区域或产业经济表现出竞争力提升,有利于支撑宏观经济质量提升,以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机会和有利的空间。在微观层面上,重点是创新竞争与合作机制,提高投入要素及其环境与产品服务功能。如前,高质量是产品服务功能高,满足要求的程度高,同时提高了生产力、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且企业发展表现出创新活力与潜力,有利于支撑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高质量。创新包括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等创新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与制度支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也是创新大厦的基石。

客观上,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由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宏观经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加总支撑过程,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解指导与调节过程,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企业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现实中,从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方面,探讨高质量发展成为热点。但从企业方面分析高质量发展,还远远不够,以致最终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道理很简单,且不说“务虚容易实干难”,把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宏观顶层设计,通过区域和产业的相关机制、制度和政策承上启下的衔接,把任务有效地落到企业,这也是很难的。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微观到宏观的“通宏洞微”也是有难度的。因此,说到底最重要、最困难的是企业高质量的有效发展。这需要实实在在的创新真功夫,面对日益复杂多变

的国际环境,在技术创新、提高质量等方面,练好“内功”才能立足,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因此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突破口。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企业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三力”是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通过创新驱动达到高质量、做出品牌。具体来说,产品高质量是高品质,即质量合格基础之上的优级等级。高品质与文化融合成为品牌,可见品牌的本质基础是由高质量决定的。持续提升品牌的质量,才能成为一流的品牌。因此,提高质量与提升品牌质量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第三,企业怎样高质量发展。如前所述,生产高质量产品必须保障产品固有的特性,高的技术、非技术指标、满足要求以及高的要求标准。一是需要高质量的投入要素。(1)在市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消费者收入及结构,预测高质量产品的市场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及其结构,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技术储备。

(2)需要投入更多的高质量要素,如人才、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模式等以及更多的优质资本。这些都是高质量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3)需要新时代工匠及工匠精神。在一定技术工艺与管理水平下,高质量需要“态度端正、一丝不苟、静心踏实、刻苦钻研”的新时代工匠,还要弘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需要制定有利于工匠成长的机制、制度与政策。(4)需要企业实施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机制、制度与政策,以及良好的质量与品牌文化。(5)需要树立品牌质量意识,担当社会责任,以创新建立并实施高于产业标准、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既提高质量又节约资源,减少排放,既有利于绿色制造,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二是需要合理的质量定位。一方面,因为在开发产品时,产品的质量水平与产品定位有关,即需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实际状况,确定产品的质量水平,这就是质量定位。在进行质量定位时,应考虑质量的边际收益,选择质量的边际投入与边际收入相等的质量水平。另一方面,基于质量定位,成本必然增加,面对生态环境要求,成本增加更加明显,因此有两种选择:提高质量,成本增加,同时以质量提升产品产生质量溢价,才有可能确保质量提升有后劲、可持续;应用价值工程方法,在提高质量要求的功能下,追求投入的成本最小,即价值系数最大。在实际质量定位中,我们应追求质量价格增量和选择合理的价值系数。显然,我们不能一味地提高质量,需要考虑投入的成本,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规范、市场监管以及文化环境等。

三是需要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众所周知,质量可以是零部件、计算机软件或服务产品的质量,也可以是某项活动的工作质量和某个过程的工作质量,还可以是企业信誉质量体系的有效性。如前所述,质量固有的特性大都是可测量的,并且通过产品、过程或质量管理体系设计、开发与实现过程,形成诸如物质特性、感官特性、行为特性、时间特性、人工功效特性、功能特性等属性,它们能够明确规定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要及其要求程度。在质量管理过程中,质量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工作质量与产品质量同等重要。鉴于产品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多,而工作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少,以及工作质量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和环境保障,所以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工作质量管理往往是重点,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则更加重要。

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同时,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决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必要的。从宏观、区域或产业经济层面上,营造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政策与文化环境,企业才能应对全球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价值链,以及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以踏实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从宏观层面上讲,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势下,要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的精神为指导,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其顶层设计,兼顾短期和长期利益,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与科技、社会与经济、生态与环境,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与政策,确保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发展的信心、实力与预期,提高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能力与平衡度,同时有利于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仅占GDP的0.1%,不及韩国、法国、美国的1/4,占研发总投资的比重只有5.1%,远低于主要创新国家15%和25%的水平。因此,需要调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的研发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从根本上解决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潜力与后劲不足的问题。

第二,从区域和产业层面上讲,基于高质量发展战略及顶层设计,结合区域与产业资源、人才、技术与资本,以及生态环境的优劣势分析,本着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制定并实施具体的区域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度与政策细则,实现开放的区域和产业优化与转型升级,

把握公平竞争与合作下差异化协同发展的相对动态平衡,特别要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域和产业经济融合,加大区域协同和关键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技术研发,引导与发布技术发展趋势,组织联合重大研发与攻关技术,制定并实施相关机制、制度与政策,为区域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的共赢机制,从宏观区域或产业角度,建立并实施相应的制度与政策,把握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实现共赢。在这种共赢过程中,面对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面临诸如“税负重、生产要素涨价、融资难”的困境,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把产业尤其是实体产业做强、做实、做精,提高竞争力,保持完整的实体产业体系、保全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体产业资产。我们还清楚地看到,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的核心,受到相关人才和技术的制约,这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可见高质量发展既是创新驱动,也是创新驱动的选择。

第四,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高质量溢价。基于高质量具有创新、高成本、高风险以及合同契约的特点,为了保护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法权益、利益与可持续创新,必须加强市场监管,保证高质量溢价。为此,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及侵权行为,保证企业创新的利益。还要加强市场准入制度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需求,提高准入门槛与资质要求,杜绝不良企业进入市场。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施信息公开,进行“无死角”监管,让假冒伪劣和侵权产品无处可藏。

依法打击行贿受贿等非法营销行为,还要打击那些不合资质、粗制滥造、非法营销的知识产权专利以及不合格的质量与品牌评价第三方机构,还需要打击虚假合同违约行为,还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币”市场,这样的市场自然会有高质量溢价,实现产品优质优价。如前所述,此溢价就是提高质量带来的产品价格上升的增量。但是质量提高的同时,还带来产品成本的上升,只有当价格上升的增量高于成本上升的增量,这种溢价才有意义,才有利于持续提高质量,相反则是负溢价。

显然,溢价是否为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依靠技术与管理提高质量时,尽可能地减少成本,最终还取决于市场监管能否使高质量产品有一个高于成本增量的价格增量。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监管不到位,假冒伪劣、侵权等非法现象出现,就有可能出现价格增量低于成本增量,负溢价就会出现。当然,正溢价是多少,还需要由市场高质量产品的供求关系决定,进而与企业

对高质量市场需求与定位的分析有关,如果发生偏差,即使市场监管到位,也有可能因需求量低而出现负溢价。

第五,加强高质量发展政策分析。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三维度的动态发展体系,由企业到区域和产业再到宏观经济的加总,需要引入价格,把实物量转为价值量和货币量。企业是真正提供实实在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由于产品和服务的种类繁杂,不可能完全按实物计量,只能引入价格,计算出区域或产业、宏观经济产品、服务的总价值量。对于细分的行业和产业,是可以按实物量加总的。这就是价格的两面性:不变的实物量和变化的价值量,或者说前者是“实”,后者是“虚”。所谓“实”是加总出来的,而“虚”是计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应关注微观经济,一方面,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高质量的载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同样,就经济学来说,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就很重要,有的学者把这种能力称为“经济学直觉”。在微观经济中,“物有所值”就是指产品、服务质量的经济性。因此,这种微观经济学的直觉,即相关产品、服务质量及其经济性的思考能力更为重要。

在高质量发展中,还有众多的高质量产品、服务的溢价,让把握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的难度更大。还有高质量发展体系,如同经济体系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美国经济学家萨金特曾说过,经济学是组织化的常识性科学。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权衡取舍,诸如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个人与群体、企业或组织能力、努力与偏好,以及激励、承诺、博弈与预期等经验关系。同时,针对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加强高质量发展应对政策,包括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以及市场监管机制、制度与政策,还有金融风险防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生态文明建设等,甚至还需要相关背景下的政策分析,防止或消除政策负效应叠加。

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政策实施条件进行分析,因为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两面性,既要达到预期目标,又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一项政策实施前必须考虑它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分析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只有当一项政策既能达到预期目标,又能防止、消除或减弱负面作用,或者至少负面作用的影响是可以被接受的时候才能实施,否则就需要重新设计。当然,对一项政策实施中和实施后的作用和效果,也需要分析与评价,以便对其进行微调与改进,确

保实施政策的预期目标和可接受的负面影响,并为下一轮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经验。另一方面,对于多项政策,还需要考虑这些政策的预期目标和副作用及其交互影响。显然,防止和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的难度很大。为此可以接受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单项政策产生的负面作用,但目的是防止和消除所有政策的负面效应的叠加。因此,需要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依靠大数据和网络技术,诸如微观计量、博弈实验、系统仿真等理念、方法与模型,进行政策交互性分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性的技术支持。

第六,营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文化。无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我们看到一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因创新意识不强或创新人才匮乏,或研发投入不足,导致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设备短缺,结果产品质量上不去,市场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水平低,反过来又影响研发、高端创新人才引进,进而进入死循环。有的企业虽然不缺研发投入,但因创新的机制、制度与政策创新成果不足,后劲不大。有的企业连研发资金都存在短缺,又从何谈创新。

因此,创新相关的机制、制度、政策以及文化是最重要的。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政策与文化的同时,还要增强创新意识,加大力度对企业尤其是对实体企业进行合规的减税,以增加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资金的投入,吸引并用好、留住人才,从而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5页)

“路径”与前文讲的“规划”虽概念不同,但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前者是布局,后者是措施,也就是“高质量发展”具体执行的方式、方法。这个“路径”既要具体,更要具备可操作性,防止“纸上谈兵”。

三、心无旁骛,“落实”是关键

“规划”“路径”有了,落实是关键。这就需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强化领先、率先意识,坚持“创新、落实”主旋律,要多点开花,突破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引才引智等工作,全力提质增效。

2019年5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七、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校培养大量的基础和工匠人才。在实施国家质量、品牌战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面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基础或工匠型人才的需求,对普通高校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会、人才、平台、项目等资源上讲,困难与压力是巨大的,是前所未有的,但机遇大于挑战。

高校培养什么人是由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决定的,在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力量体系中,世界一流大学是决定性力量,高水平大学是中坚力量,但普通高校是基础性力量。为此,普通高校面对现实存在的差距与困难,应在实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与分类管理指导环境下,要坚定信心,发现、瞄准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大量基础和工匠型人才的显性需求与高端骨干人才的隐性需求,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实现高速发展,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建议以下三个路径:首先,在全社会应重视普通高校建设与发展,加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基础性人才和工匠人才的投入。其次,普通高校走出困境需要找准定位,特色发展。政府主管部门、高校领导、教师、学生都有责任在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形成协同效应。第三,普通高校要紧密结合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对大量基础和工匠型人才的需要,充分调动和利用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9年18期 领导科学论坛)

决战于当下,才能决胜于未来。“做好自己的事情”,本质就是立足于对发展方位的判断,对发展目标的部署,对发展路径的落实,更新观念,创新机制,运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工作模式,脚踏实地,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棋局。“高质量发展”不是空洞的概念,更不是高大上的口号,它具体的,可见的,更是摸得着的现实需要和现实实践,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需要的是真抓实干,来不得半点马虎。

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以“钉钉子”精神、铺下身子抓推进抓落实,不搞“花架子”,不做“空概念”,一步一个脚印,一锤接着一锤。规划有序,路径鲜明,落实有力。我们相信,只要行动的抓手牢牢在握,就一定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布局,谱写新时代的新辉煌!

(2019年26期 现代企业文化)

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摒弃惯性思维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发表演讲,针对“高质量发展”这一话题畅谈看法。他表示:“惯性思维可能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或者说是最大的障碍。”以下为高培勇演讲摘编:

每当论及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论及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时,大家可能会把经济下行或经济下行的压力摆在第一位,但我认为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因为经济下行和经济形势的严峻至多只能放缓我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至多只能分散我们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注意力,但它不会改变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改变高质量发展方向的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决策。如果说你本来想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往前走,但是做出的决策切切实实把你向后拉,那么这样一种因素才可能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该如何表述?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可能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或者说是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会有惯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为什么又成为了一种惯性?我认为,这同我们在惯性思维语境中浸泡的时间太久有关系。比如就教育而言,在座很多人在学校里接受的经济学教育,往往和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总体而言是围绕需求管理而调控经济的一种理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谈起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该做何种抉择的时候,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这种理论的影像。从实践层面看,过去我们谈论经济发展的时候,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招商引资,即便现在请在座各位围绕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时候,各位脑子里立刻想到的,可能也是上项目、要投资,从而带来税收和GDP增长。

诚然,这样一种惯性思维任凭谁都很难摆脱。但如

果不告别、不摒弃这种惯性思维,在经济形势运转正常的时候,我们姑且还能想着高质量发展、想着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等。但是一旦遇到风浪,便会不由自主地回到原有的高速增长轨道、原有的宏观调控思维模式上去,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转变这种惯性思维。



该如何去转变?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要和自己过去的教育、所接触的理论、所熟悉的经济发展韬略和实践告别,转向新的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思维方式上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迈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有一种办法可能值得采纳,那就是我们要试着在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之间划一条相对明确的分界线,时刻告诫自己,我们现在是在高质量发展这一边,而不是在高速增长那一边,可能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比如高质量发展在四中全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表达的,那就是高质量发展包括三个要素,第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我们看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度建设的意义上为高质量发展画了这样一幅素描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它的参照系或者找到它的对立面。高速增长条件的素描,我们能不能据此勾画出来,我想应当是可以的。比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这个词我们很熟悉,关键在于“新”。提到“新”一定有“旧”,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用这十个字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提出高质量发展之前,高速增长时期的语言背景。那个时候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围绕着GDP的规模和速度而展开的。谈到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不可能绕开这两样。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GDP的规模和速度当然重要,但已经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那就是质量与效益,因而就有了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样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为了实现围绕着质量和效益而布局经济工作,谋划经济发展,才有了新发展理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GDP的规模和增速以及GDP的质量效益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呢,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当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说它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索,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是需求管理,是以逆周期调节为主要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匹配高质量发展,一定有按照需求管理政策的操作解决不了的最重要经济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显然是结构问题、供给侧问题。因而从需求管理政策迈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转变必然要发生。

其一要从需求侧移步于供给侧;第二要由聚焦需求总量转变为聚焦供给结构;第三要由关注短期平衡转为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第四要由主要动用政策手段的操作转为深化改革的行动。这样一种转变或者说这样一条分界线的勾画,对于我们转换思维方式或者告别惯性思维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否则的话两个方面混在一起,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高速增长的思维轨道上去,很容易导致似是而非的决策,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我认为这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认识到这一点在当前注意加法与除法的并用,也是特别重要。

所谓加法就是要在传统或惯性思维的轨道上加上新

的思维,比如围绕GDP的规模和增速来布局经济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现在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起码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质量和效益的追求,进而再做除法,用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速度。这时候规模和速度不是说不重要,我们只是说它位置要互换,要把质量和效益放在第一位。比如在谈到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时,一方面要注意逆周期调节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起码要做一个加法,逆周期调节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然后再做除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第一位,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放在第二位。

谈到主线就有次主线,主线加次主线可能是我们面临今天持续下行的经济压力和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央决策的要求,更是宏观经济形势本身的要求。比如在论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经济下行。在今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和此后的中央文件中,对此有一个专门的描述叫新老矛盾交织、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叠加,还有一个更全面的概括叫做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相交织,所有的这些表述告诉我们一件事,今天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是来自一个方面,而是来自一个或多个方面;不是来自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或两个或多个因素。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简单的操用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去应对经济下行绝对会有效益,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当面对周期性下行压力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政策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当面对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因素影响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恐怕就不那么有效,而必须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道理非常简单,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世界上不存在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

我们现在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谈论经济形势,讨论经济对策,而不是在高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下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是仅仅关注经济下行这一个要素,我们也必须说这是发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下行,而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下行。背景变了,照相也好做其他事也好,整个色彩都会跟着变。所以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避免出现似是而非的决策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我们必须告别惯性思维。要学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稳增长、破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2019-11-17 思客)

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点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应有不同的“规划”和“路径”。以下是对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点思考:

一、科学谋划,“规划”至关重要

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一个行业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只要深力挖掘,就会找到自身的发展优势。立足优势,扬长避短,站在国家战略方位上,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框架内,谋求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新担当新作为。那么,一份“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就显得至关重要,它是推动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导向,决定了今后的发展走向。

这份“规划”或者说是“布局”应该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全局性。视野要广,眼光要远,要洞察到未来格局的变幻和走向;重点要突出,致胜要有方,要从总体上对高质量发展提出关键的和方向性的指导;杜绝急功近利,做到久久为功,在一盘棋上,持续打好“组合拳”。

这应是一份把脉时代经济,阐释发展理念,擘画美好未来,发展思路清晰的“规划”,需要标定明确的时间与空间方位,要有关键的时间节点。无论是对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还是对抓招商抓项目等,都是一份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以此引领前行方向,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棋局。以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推动全领域从“蓄势积能”走向“发力超越”的新阶段。

目标明确,导向鲜明,战略精准,人民群众、干部职工就会对自己置身的城市、领域和自己的未来,有更强的信心,更深的期待。就会激发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最终会“众志成城”。

二、精准落子,“路径”决定走向

提质增效、创造自身鲜明的发展特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应该成为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这就需要各地区各行业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研究确定适合自己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再辅以明确的目标、主攻方向和关键举措,努力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转变发展动力、提高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这就需要找准产业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深刻分析自身的产业基础、环境条件,勇于面对“短板”,详细摸清“家底”,精准确定优势,科学列出清单,哪些产业要重点培育、哪些产业要逐步退出、哪些产业要改造提升?做到一目了然。

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问题。它考验着一个地方的发展理念,也考验着一个地方决策者的智慧和魄力。大胆舍弃,守正创新是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核心内涵。高质量发展切忌千篇一律,做到“因地制宜”尤为重要,也就是说根据地区、城市、行业的差异化,精准落子,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实现“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目标。

(下接第12页)

金砖国家合作： 变局下的使命

11月13日至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这是2009年第一次金砖峰会召开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开启第二个十年后的首次峰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峰会带有一定的风向标意义。但其意义还不止于此。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公开讲话中所说：“这次会晤是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时刻举行的。”



习近平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势头不可逆转，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强劲动力。令人担忧的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他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一定程度反映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这些话可谓意味深长，一方面指出了金砖国家合作面临的新变局，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新变局下的使命，即

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从巴西利亚峰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巴西利亚宣言》来看，作为历史并不算长的新兴市场国家间多边合作平台，金砖机制经受住了变局的考验，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使命感。

变局

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峰会，是继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以来，巴西第二次举行金砖峰会。福塔莱萨峰会最大的亮点，是金砖国家宣布正式成立新发展银行。这被视为金砖国家合作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合作走向机制化的关键举措。这与当时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对金砖机制的力挺功不可没。相比来说，2019年巴西利亚峰会召开前，外界对于巴西新总统博索纳罗对金砖合作态度是有些疑虑的。

疑虑在去年巴西大选期间开始出现。被外界称为“热带特朗普”的博索纳罗，竞选期间毫不掩饰其对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乃至本人的“亲近感”。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现民主化以来，巴西一直都是南南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以发展中国家利益捍卫者的身份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从卢拉总统到罗塞夫总统，乃至代总统特梅尔，都是金砖机制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博索纳罗当选总统是否意味着巴西外交的大转向？这是金砖机制面临的变局之一。

在贸易政策、移民政策等具体外交问题上，博索纳罗某些表现的确很“特朗普”。比如，他在就任总统一周多后就开启“退群”模式，宣布巴西退出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在对华政策上，博索纳罗竞选期间渲染中国在“买下巴西”，指责中国“掠夺性经济”，几乎是在照抄特朗普政府的剧本。不过，就任总统后，博索纳罗的对华态度开始明显转向，总体上回归到了其

前任的政策路径。

今年10月24日至26日,博索纳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巴西总统后首次访华。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国事访问,距6月底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仅隔不到5个月时间,离巴西利亚金砖峰会召开仅半个月。毫无疑问,这样的外交安排,一方面表明中巴关系稳定无虞,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金砖机制运转无恙。

成员国内部政治变化对金砖合作的潜在影响,巴西不是第一例。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之时,也曾引发类似的疑虑,因为当时莫迪在外交理念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态度,明显高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为何观望之后重新重视金砖机制?关键的原因在于金砖国家的“发展中”身份,这个身份决定了发展经济是“硬需求”。截至目前,在新发展银行发放的贷款中,印度所获得的份额最大。根据巴西官方的数据,2018年巴西2395亿美元的对外出口中,对其他金砖四国的出口为738亿美元(占比30.8%)。对于出口导向的巴西经济来说,这个占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金砖成员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影响尚且可控,那么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则是更难应对的变数。习近平11月14日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的讲话时说:“一段时间来,世界形势又发生许多新变化,既充满机遇,也有不少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动能逐渐释放,为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同时,保护主义、霸凌主义逆流而动,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加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巴西利亚宣言》写道,自上次会晤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下行风险上升。贸易摩擦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信心、贸易、投资和增长带来影响。

去年7月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期间,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之间第一轮相互加征的关税刚刚落地。中美贸易摩擦会升级到何种程度,两国的磋商能有多大成效,形势还不明朗。所以,《约翰内斯堡宣言》中甚至都没有出现关于“保护主义”的表述。一年多以来,国际贸易环境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特朗普政府肆意升级贸易摩擦,并威胁到包括金砖国家在内全球经济的增长。习近平所说的“全球化遭遇逆风”,正是对保护主义抬头这一趋势的警示。

使命

《巴西利亚宣言》对保护主义做了旗帜鲜明的表态:“单边和保护主义措施与世贸组织的精神和规则相冲突,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避免采取这些措施极为重要。”在政

府间官方文件中,态度上有共识才会在宣言中得到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金砖国家已经在政治上把反对保护主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保护主义浪潮短期内不太可能偃旗息鼓,反对保护主义很可能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阶段性使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2009年金砖合作机制诞生时就肩负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和趋势使然,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稳定与繁荣的内在需求。正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说:“金砖国家团结合作,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看似偶然,但实属历史必然。”他强调,“没有哪个国家天生独领风骚,也没有哪种模式注定高人一等。全球化时代,不应该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而应该是所有人造福所有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砖国家推动改革的使命更有紧迫感了。《巴西利亚宣言》写道,“我们重申迫切需要强化和改革多边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未能做出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调整”,宣言称“对此深感失望”。对比此前金砖峰会的宣言,这样直白的表述还属于首次。不仅改革的紧迫感在增加,改革的任务也在变重。十年前金砖国家组织成立之时,世界深陷金融危机,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承诺自由开放贸易体系、尊重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至少有着最基本的共识。但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政治上民粹主义的崛起、经济上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基本共识”面临解体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金砖国家逐渐承担起秩序的“改革者”与“维护者”的双重角色。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今年年底可能面临瘫痪。今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大阪会晤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上诉机构对该组织的正常和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我们忆及解决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的紧迫性,敦促立即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巴西利亚宣言》再次提到,我们强调破解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的紧迫性,呼吁所有成员同意立即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进程。

在某些学者看来,之所以要承担起秩序的“维护者”责任,因为金砖国家首先是秩序的受益者。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塞德里克·德·康宁,在题为《金砖国家:捍卫全球化的最后防线?》的文章中称,在美欧“内向化”

之时，金砖国家不仅在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在增加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机制的承诺。他认为，关键原因在于，现有秩序的某些方面，是对金砖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

康宁也指出，在金砖国家秩序“维护者”角色越来越凸显的同时，曾经是全球治理、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引领者的美国、英国以及某些欧盟国家，却越来越倾向于觉得全球化走得太远。这种理念上的分化，无疑将给秩序的维护和改革都增加变数。所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讲话中强调，金砖国家要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推进各领域合作，为五国人民，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挑战

与第一个十年相比，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金砖国家合作，在外部环境上最显著的变化是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虽然截至目前金砖合作经受住了成员国内部政治变化的考验，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国战略竞争将对金砖合作产生何种影响，很可能是金砖国家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学者维塔利·科济列夫，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对金砖国家的政策后发现，特朗普完全继承了其前任奥巴马总统试图瓦解金砖国家凝聚力的“对冲”战略，而且在“分而治之”上力度更大。

对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表现出的“亲美”情结，特朗普立刻给予了积极回应。虽然美国长期以来都是美西贸易的逆差方，但视贸易赤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特朗普，

并没有把枪口对准巴西。今年7月，特朗普还宣布巴西为“非北约盟国”。特朗普政府高调推出的“印太战略”，其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就是提升印度的战略价值。如果大国战略竞争升级，美国很可能把拉拢印度和巴西作为潜在的外交选项。这样一来，即便金砖合作能够得以继续，合作的进度和力度或许也难保不受影响。

金砖成员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差异，可能是未来金砖合作面临的另一挑战。美国学者丹·斯坦伯克，把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十年前的预期作了对比，结论是中国的表现超出预期，印度勉强达标，其他成员国则都不如预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9年至2018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从16%增加到24%。但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在金砖国家中占比从53%增加到67%，印度占比从14%微降到13%，俄罗斯与巴西则分别从18%、13%大幅下降到9%、8%。

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往往与经济改革的进度密切相关。而改革进度的差异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优先排序。印度选择不加入“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主要是出于保护国内制造业的考虑。也就是说，在金砖合作乃至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印度会把“保护”置于较为优先的位置。巴西与俄罗斯没有强烈的“保护”倾向，与它们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资源与大宗商品出口不无关系。但如果改革这种经济结构，又会影响其经济增长潜力。而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属于内部治理问题，仅靠金砖合作是无法解决的。

（2019年24期 南风窗）

（上接第19页）

作任务，要学会并且善于说“不”。比如，可以把上级领导交办的任务制作成工作日程表，向上级汇报自己的工作饱和度情况。同时说明如果工作量再增加，工作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要保证工作质量，就必须调整工作任务分配情况或者工作任务的优先次序。总之，通过剖析“能者多劳”这一管理行为，最大的理论启示以及实践建议是：人的成长本质上是从“多劳者能”到“能者多劳”、从“能者多劳”到“能者少劳”、从“能者少劳”到“爱者多劳”的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和过程。

对“能者”来说，没有“多劳”往往很难成为“能者”，成为“能者”本身就是“多劳”的奖励。因此，“能者多劳”应该成为“能者”个体自觉追求的内在价值观，但不能成为一些管理者强加于“能者”身上的“咒语”。对管理者和大部分普通员工来说，应该把“能者多劳”和“多劳多得”结合起来。对业务骨干和管理层级来说，应该适当强调和倡导“能者少劳”“劳有所值”，塑造以奋斗者为本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文化。

（2019-12-1 人民论坛）



组织管理中的“能者多劳” 合理吗？

能者多劳，不仅是一条职场“潜规则”，在家庭内部、甚至在一切有组织存在的地方，这似乎都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你能干，当然要多干一点。单位里大家公认的“能者”，不仅同事会经常找其帮忙，领导也倾向于把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压在其身上。而一些“能者”有求必应、来者不拒，尽管有时未必情愿，但总是“心太软”，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久而久之，“能者”越干越多、越来越辛苦。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能者多劳”，到底合理吗？



“能者多劳”为何出现？

“能者多劳”这一管理行为的出现是“能者”个体、管理者、组织管理制度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客观结果。从个人层面来说，“能者多劳”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能者多劳”，主要是说能力强的人应该多干，这意味着能力强弱是组织分配工作量的主要标准。但是，虽然以能力强弱作为工作量分配的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只以能力强弱作为分配标准，不同时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这就是不合理的。从能力和结果二者的比较来说，以结果为工作量分配标准是比较合适的，即得到多的人应该多干，得到少的人应该少干。然而因为

得到多少往往是事后评价，付出和结果之间并不是线性决定关系，这就决定了用结果标准虽然合适，但可操作性比较低。

还有一种分配标准：想得到多的人多干，不想得到多的人少干。一般来说，多数人可能都想多得一些，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多干、多付出。在这些想多得的人当中，有能力强一些的，也有能力弱一些的。毫无疑问，能力强一些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干事的动机较强；能力弱一些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干事的动机较弱。当然，能力强弱是相对的，能力较强的人会倾向于做更难的事情，从而获得更大的回报。能力较弱的人则会倾向于做简单的工作，从而获得较小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能者多劳”，反而是能力弱一些的人“多劳”（因为一次劳动的回报较少，所以通过量的积累实现较多的回报）。由此可知，“能者”更有意愿“多劳”，但更准确的是“需者多劳”。

从管理者层面来说，其更习惯于让“能者多劳”。通常来说，管理者分配工作任务时，会重点考虑下级的工作效率以及结果情况，并以此作为分配的基本标准。因为“能者”工作效率高且工作效果好，所以管理者往往会把急难险重的工作分配给“能者”，使得管理风险相对较低。相反，管理者如果把相同的任务分配给能力较弱的人，不仅管理风险将会变大，而且其关注工作任务的频率和次数也会增加，心理压力和管理责任会增大。由此，理性的管理者会习惯于让“能者多劳”，“鞭打快牛”的倾向随之出现：越能干，干的越多；干的越多，越能干。

从组织层面来说，制度建设的短期导向造成了“能者多劳”。“能者多劳”这种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工作收入相对固定和稳定的单位内部，收入的分配并不因为“能

者”干得多就得到的多，实际是干多干少都一样。这种不以奋斗者为本、不以“能者”为本，过于强调短期利益的情况，凸显了组织制度建设的短期化倾向。

传统的组织制度建设凸显了严格的等级制和控制导向，上级机关往往有权、有钱、有资源，而基层恰恰有责、无权、没资源。干事的责任是基层员工的，但基层员工干事的考核评价以及收入分配权却是上级机关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以及制度建设，导致工作任务分解分配到基层就要求必须完成，从而最终落到“能者”身上。实际上，谁干得多谁干得好，基层最清楚。但基层往往没有考核评价权以及收入分配权，所以很多时候给“能者”的激励更多的是来自管理者个体的精神激励以及情感激励，但这种激励在很多时候是不可持续的。而缺少“多劳多得”的物质激励以及组织层面的精神激励、荣誉激励等，“能者”就难以保证对组织的持久忠诚和奉献。能者可以多劳，但怎样才算合理？

首先，“能者多劳”，但“多劳”应该“多得”。“能者多劳”，但“多劳”就能够“多得”吗？如果“多劳”不能“多得”，反而“多劳”的成果被别人所侵占，“能者多劳”就会成为一块“遮羞布”。由此可知，组织可以提倡“能者多劳”，但更要强调“多劳多得”，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不会伤害“能者”的积极性。

当然，“能者”可以“多劳”，“多劳”可以不“多得”，但这是以“能者”的自觉行动为前提的。“能者多劳”可以不多要，但单位必须做到“多劳多得”，必须弘扬“多劳多得”这一价值观。组织层面一定要有“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以奋斗者为本的组织架构以及管理制度。比如，运行层面一定要有具体的、科学的方法；制度建设层面一定要有“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绩效考核制度，保护好“能者”的工作积极性；管理优化方面一定要把资源分配权下放，确保管理者的工作责任、工作权力和工作权利相统一，让直接管理者拥有对“能者”工作绩效的考核权、定价权、分配权以及“能者”职位晋升的推荐权。

“能者多劳”，但“多劳”应该有边界。“能者”工作能力强、干活快、干活多、质量高。所以，上级管理者容易把更多的任务交给“能者”，但这应该有边界，即能力的边界和时间的边界。一方面，“能者”虽然有能力强，但毕竟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在“能者”能力边界之外的工作，应尽量不要让其去做。每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在起步阶段，还是应该集中到一种核心能力的培养上比较妥当。另一方面，“能者”虽然有能力强，但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一旦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平衡被打

破，短时间内承接了大量的工作任务，就会很容易手忙脚乱，从而在工作中出现失误甚至错误，耽误工作进度，引起管理者的不满。

“能者多劳”，但应该劳有所值。只讲“能者多劳”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通常应该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但也有不少情况，特别是跨越了普通员工这一层级，到达一定的管理岗位和领导岗位时，“能者多劳”就会变得比较常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解释了人的需求多样性和人的需求层次性等特点和规律。人的成长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需求层次的转移，从满足物质需求到社交需求、自我价值需求等不同层次。做到“能者多劳”，关键是看“能者”是不是劳有所值，看“多劳”有没有创造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不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不值得的。在有些时候，虽然“能者多劳”得到的物质待遇并不多，但如果精神荣誉到位，特别是赢得了单位的认可、团队的尊重以及促进了团队的成长，这也是值得的。总之，我们应准确把握“能者多劳”的多重视角，遵循“能者多劳”的运行逻辑，进而实现多方的共生共赢以及协同进化。

“能者多劳”，最终是为了“少劳”

片面强调“能者多劳”，似乎是实现了人尽其才，使得“能者”这一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使用，“能者”的潜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挖掘，且能者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在一些时候，“能者”不仅没有很好的发展，甚至逐渐蜕变为失去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普通员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能者多劳”的背后是另一部分人员的能力被闲置，他们的积极性和潜能处于“沉睡”状况，无人关注，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要改变单纯强调“能者多劳”的情况，管理者需要站在更高更远层面进行思考，“能者多劳”几次可以、短期可以，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不利于自身领导力的提升。管理者应从团队建设的角度出发，通过导师制、设置 AB 角等方式，把能力强和能力弱的员工搭配起来工作，定期沟通业务、沟通思想、沟通感情，有意识培养能力弱的员工，提升其能力，把团队成员建设成为不同方面的“能者”。人的能力从来都是用进废退的，越用越有能力，越不用越没有能力。所以，单位可以在短期内鼓励“能者多劳”，但是一定要带动弱者“多劳者能”，使弱者逐渐变成“能者”。事实上，“能者多劳”的目的肯定不是一直“多劳”下去，而是为了“少劳”，即每个人只做别人做不了的关键工作。

此外，“能者”也要寻找适当时机，对管理者分配的超过自己能力的，特别是工作饱和度较高情况下的工

(下接第 18 页)